

#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刘斌志

【摘要】 伴随当代哲学对多样化、地方化以及实践性知识的认可，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先后经历了文化转向的过程，由此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在地化、本土化与文化转向。这种对于多样化本土性文化知识的重视，必然带来非西方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以及理论自觉。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文化转向和文化自觉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党的领导、人民中心、中国文化品性、大社会工作观、整合创新性思维以及回归中国社会实践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文化自信必然带来理论自觉，即通过文化自认、文化自知、文化自觉、文化自醒、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文化自反以及文化自强的途径，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理实对话以及学科对话过程中，最终实现其理论自觉、理论自反、理论自新和理论创新。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文化自信；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769 (2024) 05 - 0032 - 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①</sup> 作为一门重要的应用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也需要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回应时代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其中最基本最根本的就是反思和重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而要实现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创新，不仅要厘清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更需要从“西方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巨幕中走出，回到中国，直面“生活世界”，通过理论反思和文化批判克服传统二元论及其本质主义的窠臼，克服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身体与心灵、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对立，把专家知识和日常实践以及生活世界沟通起来，促进社会工作理论的文化转向，转向在地化的问题和方法以求理论的重构，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

## 一、文化转向：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追寻

社会工作自从创立以来，一直坚持“人与环境互动”的基本理念，其中的人包括个体内在的生理、心理以及精神方面，环境包括了家庭、学校、社区、文化传媒等方面，互动则重在对关系的解释和聚焦。因此，从一开始社会工作的分析框架就包括了文化的要素，但在专业化与科学化过程中也不断受到

【作者简介】 刘斌志，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重庆 4013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青少年虚拟社交风险的生成机理与网络社会工作介入研究”（23XSH005）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20年代“社会诊断模式”以降，社会工作理论先后受到精神分析学、诊断学派和功能学派、心理社会学派、问题解决模式、危机干预模式、系统视角、赋权视角、自体心理学、认知行为治疗、寻解导向、优势视角、叙事治疗、结构社会工作、存在主义以及社会发展视角等不同学科理论的影响。其中，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科学实证主义为主，也包括了人本中心、存在主义、生态系统理论、赋权视角以及女性主义等人文主义的影响。从大卫·豪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四分模型出发，可以发现除了功能主义社会工作之外，阐释主义社会工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以及激进社会工作基本上都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和价值。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工作的文化转向较为明显，突出表现为理论发展的多元范式尤其是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战”后，西方国家少数民族要求被承认、被尊重并实现真正平等，在哈贝马斯关注社会条件和文化差异的宪政民主思想、泰勒要求民主政体承认社会族群文化特性的政治承认思想以及解构主义有关社会强势族群拥有政治和文化话语霸权的理论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坚持反压迫和反种族歧视，同时也包括反阶级、性别、身心障碍、性认同以及年龄的歧视，强调对每个社会不同族群团体的存在以及不同族群及其自身所拥有的不同文化模式都保持接受态度，并认为不同族群文化是等值的，承认社会的多元性并允许个人保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工作经历了种族中心观、族群敏感观和族群觉醒观三个阶段，并通过个体干预阶段、互动干预阶段以及社会文化干预阶段来实现其服务的目标。正如德拉尔得·苏所指出的：“文化多元理论指导之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应该是这样一种助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确定符合其生活经验和文化价值观的目标；从个人、团体以及社会的层面来确定案主身份；在治疗过程中提倡使用普遍的文化差异性策略；在评估、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平衡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从而解决案主和案主所处的社会系统的问题”。<sup>①</sup> 克伦和吉姆也特别强调：“只有尊重人类需求的共性，尊重满足这些需要所采用的不同文化手段的独特性，你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文化社会工作者”。<sup>②</sup>

纵然历经百年沧桑，社会工作依然面临着是不是一个专业，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是否可以被当作学科等核心的问题。<sup>③</sup> 尤其是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一门科学和学科，以及“特”在何处？换言之，面对如此强大的西方社会工作体系的宰制，倘若抽离掉西方的要素和内容，当代中国社会工作还剩下什么？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当代社会工作可以从中汲取什么营养？社会工作为什么会遇到“说的時候天下第一，做的时候有气无力”的尴尬？这些问题的回应，都需要放在一种包括社会文化的全人思维视野下回答，从而实现社会工作理论的文化转向。这不仅可以揭示中国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深层内涵与文化机制，更能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环境互动关系及其和谐之道的精髓，并能够弥补西方社会工作科学实证主义发展所缺乏的“东方人文智慧”，最终在东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融会贯通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提升社会工作服务中国情境的实践能力和发展本土模式的理论活力。

## 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文化转向的时代立场

1997年，费孝通先生曾写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④</sup> 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文化转向就是要有这种文化自觉，具体表现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大社会工作观的视野，坚持古今中外求同存异的整合性原则，在尊重多元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元化、具体化、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方法技术，实现社会工作理论在主题、视角、论点、论据、结构以及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性发展。具体来

<sup>①</sup> Derald Wing Sue,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Chicago: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5, pp. 125-127.

<sup>②</sup> Karen V. Harper and Jim Lantz, *Cross-Cultural Practice: Social Work with Diverse Populations*, Chicago: Lyceum Books, 1996, p. 2.

<sup>③</sup> 徐选国：《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社会工作的想象力》，《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sup>④</sup>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说，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创新的文化自觉需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和立场：

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不仅是伟大的认识和解释工具，更是伟大的改造人和世界的工具。西方社会工作一直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拓展了激进社会工作的新空间，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到结构社会工作、反歧视社会工作以及批判社会工作都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是历史和社会人的假设。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去分析“人与环境互动”的本质，关注这种互动中所产生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异化形态及其解放策略；而且要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及其能动性思想入手，深入分析社会工作服务中服务对象主体性的核心动力、表现形态、生成机制及其激发可能，从主体性视角深入剖析助人自助的内外因子；更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汲取思想魄力，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运用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等科学方法来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提供文化支持。<sup>①</sup> 社会工作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结构视角运用到具体生活场景的阐释与实践中，更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经验中借鉴本土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经验。<sup>②</sup>

二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延续专业化与社会化的道路，具有其科学实证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具有丰富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提供了历史积淀与理论素材。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就强化党对济难会相关工作的领导，要求“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在政策上须完全受党的指挥”。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各革命根据地内部也十分重视对普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并十分强调社会救助与扩大生产、勤俭节约、革命动员以及防灾减灾工作相结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群众路线和人民中心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救助、防灾救灾、民政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以及拥军优抚社会工作等领域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服务，以实际行动满足了根据地人民的现实需要。党的社会工作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价值源泉、方法素材以及政治借鉴。<sup>③</sup>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体系和框架，并在改革开放以后持续推进现代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通过科学发展观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在应对各类灾害灾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的健康与发展为最高追求，最终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不仅成功实现了本土社会工作服务的创新性发展，更为国际社会工作界提供了社会治理、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救助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支持与持续的思想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sup>④</sup> 作为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更应该纳入党的领导体系和框架中。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群众路线，与社会工作的以人为本和社会关系的基本价值理念有高度的契合性，并以其独特的群众工作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及实事求是的作风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本土动力与理论契机。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全盘干预和负责社会工作的具体事务，而是政治方向的领导、思想信念的引领、政策法规的保障以及社会资源的支持。<sup>⑤</sup>

三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同的立场产生不同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sup>⑥</sup>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立说、为人民立论。<sup>⑦</sup> 首先，要尊重人民的价值。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要始终相信人民所具有的伦理和社会价值，相信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远远超越个体所具有的伟大能量，以

① 王艳：《浅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的作用》，《中国社会工作》2020年第1期。

② 童敏、刘芳：《新时代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回顾与前瞻》，《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③ 袁光亮：《延安精神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理论版）2021年第7期。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⑤ 黄辉、姜海燕：《社会工作去行政化中党的领导问题研究》，《大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⑦ 潘宁、周毅：《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3期。

此打破个体原子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冷漠和疏离，更加注重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对个体的超越。其次，要汲取人民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要将古往今来中国人成功处理个人自身、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环境关系的有益经验视若珍宝，纳入社会工作的解释框架与干预策略。比如，古代家风家训对于家庭社会工作理论的充实，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拓展，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对于个案工作的启示，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经验对于社区工作的借鉴，都充分说明人民的在地生活智慧是很好的理论素材与资源。再次，要直面人民的诉求。正是回应广大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需要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回应二战后大量伤员的辅导需求才诞生了更为直接快速的行为主义。为了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主义所带来的资助减少和绩效考核才催生了各类短期和聚焦问题的心理疗法。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也应该积极回应当前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只有在回应人民现实需要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理论之花才能常开常盛，理论之树才能长青。最后，要促进人民的福祉。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最终的目的都是在于服务人和改造社会。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目的就是实现个体的解放、群体的团结、社区的融合以及社会的发展，提升最广大人民的社会福祉。费孝通先生一生追求“志在富民”，并身体力行去践行这一学术追求。同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也要有“顶天立地”的学术追求，一方面要将理论积极付诸一线社会服务实践，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提升一线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提升一线社会服务的质量与成效；另一方面，更要将理论积极转变为社会政策、建议、法规和文件，用以促进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民所用，于民有益。

四是要坚持弘扬中国文化品性。所谓中国文化品性即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气质、文化模式及其根本心态的总称，其主要渊源于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积累。社会工作服务的是人，分析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自然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丰富的文化气质与品性出发，去建构其理论框架。当代西方已有不少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思想的。比如荣格就非常推崇《易经》与禅学，撰有《东洋冥想的心理：从易经到禅》，其本人也非常推崇道家的《太乙金华宗旨》；日本的森田疗法正是受启发于道家的顺其自然观；正念疗法更是大量学习了东方佛学中的静坐、冥想、禅定和修身术等思想和技术。可见，社会工作在解释人与社会环境互动框架的过程中，要遵循中国文化品性。一方面，要尝试从中国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修身为本”“和而不同”等主导观念出发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框架，重视从“仁义礼智信”“中庸之道”“内圣外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求多福”以及“知行合一”的基本精神去理解和激发个体的潜能，重视从“仁者爱人”“先忧后乐”等基本价值出发去理解和营造社会环境，从中国文化的心理及社会分析框架去构建社会工作思维方式和逻辑体系。尤其要重视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化观、自我观、尚和心态、人情观、脸面观、孝道观、报恩观等所蕴含积极因素对社会工作的意义。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善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改变人、社会及其两者互动关系的技术与智慧。比如《周礼》中的“因情生梦说”“六梦说”，《内经》中的“寻梦治病”，孔子的“因材施教观”，中医秉持的“阴阳五行二十五种类型说”，中国绘画的“和为美、自然美、含蓄美、意境美、个性美以及神韵美”思想，中医养生中的“兼顾生理-心理-自然-社会四因素的整体养生模式”等思想对于微观社会工作理论具有较强借鉴意义。而中国古代教育中的榜样示范法、环境熏陶法、践履法，以及心理治疗的情志相胜疗法、开导劝慰法、转移注意力法、习见习闻法、准行为矫正法等均可以纳入相应的理论探讨。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还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与人相处、社区发展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经典思想，比如“正德、利用、厚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观念，“守望相助”“推己及人”“成人之美”“远亲不如近邻”等社会关系调节观等。

五是要坚持大社会工作观。我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精神的指引下，创立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借鉴此一创新成果，也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定位为关于人与环境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的条件、机制及其实现策略的应用性社会科学。这一定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与人为中心的思想，更是坚持了一种大社会工作观，强调只要是促进人与环境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的工作，即可被视为一种专业社会工作，不仅包括了西方所强调的基于新教伦理和西方福利思想的所谓“专业社会工作”，也不排除中国历史与现实促进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民间实践与官方政策，更不会歧视和排斥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促进贫穷人口、残障人群以及患病人群与其周围环境斗争与平衡过程中所做出的尝试和

努力。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社会保护、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这些也都是大社会工作观所应该包括的内容与领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要基于人的多样性、价值性与主体性而坚持一种大社会工作观，既包括为儿童、青少年、老年、女性、残疾人、违法犯罪者、军人及其家属以及贫困者的服务，也包括为渔民、矿工、长途车司机、农民工、犯罪嫌疑人、艾滋病感染者以及性少数人群等群体的服务；既包括在家庭、学校、社区、医院以及企业等场所的服务，也包括在监狱、殡仪馆以及军队开展的相关服务；既包括物质救助、心理支持、情绪辅导、危机介入、关系协调、技能培训、生命教育、职业辅导、行为矫正等直接服务，也包括方案策划、人员培训、资源链接以及社会研究等间接服务；既包括生理层面的治疗和护理配合服务，也包括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服务，更包括可能涉及的精神与心灵疗愈服务；既包括对个体的辅导，也包括对环境的改造，还包括对压力事件的介入，更包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围绕这些层面的服务，不仅包括民政部门的工作内容，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商会等组织的服务也都具有专业社会工作的属性与特征，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司法、公安、人事以及农业部门都有促进人与环境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的需要，也都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拓展空间。

六是要坚持整合创新性思维。坚持大社会工作观与坚持知识的多元性是一体两面且相辅相成的。针对当前社会工作理论重科学轻人文、崇尚西方轻视本土的局限，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需要坚持一种开放共享和学科整合的视野，在整合中求得创新。具体来说，既要整合西方一百多年社会工作专业化和学科化发展过程中理论、知识以及方法技术规范化和专业化的经验，深入学习社会工作吸收借鉴心理动力学、心理与社会理论、认知行为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生态系统理论、人本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理论的经验，更要掌握中国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福利服务的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经验，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社会工作服务迅速拓展的经验；既要积极挖掘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中关于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知识点，更要充分拓宽视野和思路，促进社会工作与音乐、体育、表演、美术、建筑以及城乡规划等学科知识的融合发展；既要充分认识到科学实证主义在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规范化中的方法意义，也要认识到人文主义和诠释理解在保持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方面所发挥的引领作用，更要看到当代以来社会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在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反身性和创新性方面的价值，通过多元视域融合来更新社会工作关于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及实践论，拓展社会工作研究的主题、视角、论点、论据以及方法技术。

七是要回归社会服务的实践。社会工作是由“社会”和“工作”两个词组成的。一方面，所谓“社会”，强调的是社会性，即秉持社会学分析的视角，不仅仅关注到人，更关注到人所在的社会多元环境，尤其是关注到家庭、社区、社会以及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性”就是强调社会问题的聚焦、社会分析的视角、社会资源的整合、社会关系的协调以及社会和谐的目标。另一方面，所谓“工作”强调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性，不仅包括社会服务的实践和价值道德的实践，还包括社会政治的实践。在现实服务中，“实践性”就是强调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性、可行性、可靠性以及实效性。基于此两点分析，社会工作回归社会实践有四个维度：首先，要回归社会大众。社会工作从最初的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逐步扩大到对有需要的个体与群体的关怀，始终坚持以服务社会大众为专业宗旨。在中国情境中，社会工作就是要做到“我为人人”，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人人为我”的守望相助。其次，要回归服务实践。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理论不仅要探讨人与环境互动的本质属性、具体形态、影响因素、机制模型，更注重促进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服务方法、服务技术、服务策略、服务行动以及服务成效。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基本方法，社会工作理论更需要从实践中发现并提出问题，并对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最后通过实践检验并完善理论。因此，服务社会大众，就是社会工作的底色和本色。社会工作不仅仅是助人为乐，更主要的是助人为业。再次，要回归生活智慧。社会工作是一个职业化的解困救难的专业，其根源于西方慈善服务的实践。而在此之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民众都有自己解决困难的途径与办法，虽然未必达到西方所谓的专业化程度，但至少有其可行性与实效性，否则人类社会难以发展到今天。在今天的中国，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工作在部分领域和部分人群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未必就一定不如专业化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如此说来，倒不是否认西方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专业化与科学化的价值，而是强调本土智慧在社会工作理论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和作用。甚至可以说，本土智慧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出发点和必需要素。从这个

意义上说,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等要素都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源头。<sup>①</sup>最后,要回归文化自信。在知识的多元性、服务的实践性以及生活智慧的重要性支撑下,就可以充分发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处理个体内在、群体关系、家庭相处以及社会互动方面具有丰富多样、千奇百怪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技巧。比如中国传统儒道释都蕴藏的知变适变求变之道、修身齐家之术、内圣外王之法、和而不同之美以及从容中道之德,都是极好的价值伦理元素。<sup>②</sup>诸如魏晋玄学、程朱理学以及阳明心学等中国古代哲学也蕴含了诸多社会工作理论创新的哲学营养。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丰富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丰富的社会福利、社会建设以及社会治理经验,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作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 三、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文化自信的起承转合

郑杭生教授指出:“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逐步消除这样那样存在的理论失觉、理论盲目、理论自卑、理论矮化的必经之途,是逐步消除中国社会科学界主体性缺失以至主体性危机的必由之路。”<sup>③</sup>这一疾呼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和理论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一个文化自信和自信的过程,更是一个理论自觉和创新的过程。

#### (一) 起源: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文化自信

首先,是要有文化自认,即认识到社会工作理论有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的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个专业,更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社会工作既有其科学规范性,更有其社会人文性;既有其服务实践性,更有其意识形态性。无论是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需要认识到社会工作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政策体系以及制度安排,并警醒到这些方面的中西差异体现在我们所教所学所考所用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方法技术以及具体实践中,并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敏感性和文化分析自觉性,而避免超然现实社会文化情境去简单移植、嫁接或实践西方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分析逻辑、服务框架和理论命题等。

其次,要有文化自知,即明白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背后的文化假设是什么。当然,对社会工作中西文化背景差异敏感,并不是排斥西方社会工作文化,而是要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学习、掌握、筛选和善用西方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即对西方社会工作文化的融通。景天魁将“融通”从空间性维度和时间性维度定义为“会通中西、贯通古今”。<sup>④</sup>同样是解决人与环境互动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在那个年代就提出了社会工作的某种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社会需求和背景是什么?这个理论依据了什么哲学理论和社会思潮?这个理论的概念从何而来又如何建构?这个理论借鉴了什么学科的知识?这个理论是如何贯通文化和现实的?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地去了解和学习,只有了解西方社会工作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机理,才能真正掌握理论发展和建构的方法。

再次,要有文化自信,即自觉认识到我们自身所持有的社会工作文化经验与精神结构。在洞悉了西方社会工作文化假设、发展历史、生成机理以及演变过程之后,就需要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文化后设、文化品性以及文化基因,并自觉将社会工作与文化传统、当代价值联系起来。一方面,要自觉认识到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汲取营养,更要从中国革命文化中汲取价值理念,还要从鲜活的当代社会服务实践中提取智慧;另一方面,要充分提升社会工作研究者和从业者的文化自信,即不仅仅满足于目前政府购买所资助的经费、所要求的形式成效以及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是要反思社会工作理论和模式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如何,反思服务实践及成效背后的文化经验,反思如何从服务实践中提炼理论要素与精神结构。

最后,要有文化自醒,即醒悟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贡献力量。文化自信的可见成效就是文化自醒,即强烈的文化自信的动机和意愿,并愿意付诸行动去发掘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和力量。无论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始终坚持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① 徐选国、侯慧:《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进展》,《社会工作》2013年第4期。

② 何雪松:《社会工作:知变、适变、求变》,《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 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④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路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是近代知识分子舍身追求的“救亡图存”，还是费孝通先生身体力行的“志在富民”，都是不同时代仁人志士的文化自醒。只有激发了个体和时代的文化自醒，才能掀起浩浩荡荡的文化自强自立自信自新的时代巨浪。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建构和发展，正是需要这种文化自认、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之后的文化自醒状态。

## （二）承续：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文化自信

首先，要有文化自信，即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文化的东方之美。西方文化具有主客二元论、身心二元论以及注重发挥主体性和改造外在性的传统。而中国文化却更强调中和思维和生生思想，从《易经》的“天人合一”到中庸思想，从“修身为本”到“推己及人”，再到“各安其所”，无不展现了中国文化自强不息、从容中道以及和而不同的东方之美。潘光旦先生讲的“天地位、万物育”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都充分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并从这种自信出发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就是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格局和视野，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工作要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同样也是社会工作所要坚持的一种文化自信和东方之美。

其次，要有文化自尊，即尊重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文化的发展规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就必须尊重知识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既可以回到原生态的中国文化中去研究中国人的文化与社会互动规律，也可以从当下人类行为、实物文化、精神状态和政策制度中去研究其所蕴含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既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提炼出独特的概念、方法和技术，也可以结合中国文化重构和拓展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框架，还可以从中国本土实践中扎根和凝炼出独特的方法和技术。杨中芳认为那种“在外国顶尖的学术杂志内寻找研究题目，找出能反驳或补充他们研究理论的想法，建立假设，然后用实验或问卷得到的数据去支持、修改甚至推翻原有的理论”的做法，便是一种对文化不尊重的表现。<sup>①</sup> 这既没有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意识，也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理论体系，更没有自己的范式和术语，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式研究成果，只能是不断验证和发展西方社会学理论。

再次，要有文化自反，即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反思与批判，在反思中汲取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的精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秀和精华之处，也会有其不足与局限所在，这正是文化的多样性和魅力所在，也是文化生根于具体情境的本质。中华传统文化有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忧患自省、和平安定、正道直行、舍生取义、勤劳节俭、修身克己以及艰苦奋斗等精华因子，也有其宗法等级观念、人情裙带关系意识、三纲五常、忽视个人、压抑个性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和相互矛盾的糟粕之处。<sup>②</sup> 这些都需要社会工作者有所反思和反省，并在社会工作理论建构中加以克服和弥补。

最后，要有文化自强，即有持续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文化的行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其鲜明特征和理论品格就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的最终魅力不是束之高阁，而是去生活，去践行，去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与社会工作不是彼此独立的静态关系，而是借鉴互动的动态关系。因此，要在继承、发展和时代转化中国文化过程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近年来，景天魁带领研究团队从荀子的群学思想出发，通过对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的梳理，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学史，并与西方社会学进行对话，不失为“文化自强”的典范。<sup>③</sup>

## （三）转化：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自新

首先，将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转化为理论自觉。“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具体化到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更主要表现为“理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文化自觉”的实践要求与具体形式就是“理论自觉”。<sup>④</sup> 对于社会工作研究者来说，理论自觉包含对理论学习、理论选择、理论反思以及理论创新的自觉。一个学科在建构过程中，需要不断有大量的理论更新和完善作为整个学科体系架构的支撑，而理

① 杨中芳：《用本土进路作社会/文化心理之我见》，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首届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暨2013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年会论文，武汉，2013年12月，第230页。

② 任洁：《论文化自觉及其实现路径》，《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

③ 景天魁：《论群学元典——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④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论的产生和发展，在学科初始知识架构的基础上，往往又来源于研究者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理论自觉在社会学学科之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阐释。<sup>①</sup>

其次，要敢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行多维反思。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西方社会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形态，并实现了其全球化的扩张。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不是重新开始或“另起炉灶”，而完全可以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批判基础上借鉴和更新。一方面，需要全面而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并选择自己所倾向或适用的理论进行深入分析与具体运用；另一方面，更要在具体运用中反思这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运用中的优势和限制，尤其是难以适应具体生活处境和文化脉络之处。比如，用西方社会资本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关系”和“人情”，或者以西方公民社会为蓝图来设计中国社会治理之道，都可能会出现文化冲突与适用限制。<sup>②</sup>同样，用西方的女权主义来武断处理中国的家庭问题，或者用西方的社会融合理念来设计中国的精神障碍患者服务，抑或用劳资冲突观来开展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均可能面临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困境。

再次，要善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行更新与拓展。中国的社会工作最终是要服务于中国人和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不能依据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本本”来“削足适履”，而是要从实际出发，从中国民众的需要和问题解决为本，让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为我所用”。比如，生态系统理论、危机介入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均可以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新与运用。

最后，要基于本土智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中层理论。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根本出路是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具体来说包括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一方面，理论创新就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结构，从东方的思维逻辑和概念框架中去理解、解释和应对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服务与实践议题，具体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中层理论。社会工作的中层理论既是可以指导实践，但并不必然下降到微观的工作假设或技巧的层次；又具有一定的抽象程度，但不尽然是一般性的概括，而是对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的指涉。<sup>③</sup>换言之，中层理论既有现实敏感度和实践可操作性，又能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文化的观照力。具体来说，从中国文化的超越性和体验性出发，充分发挥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心”“神”“性”“气”“理”等核心概念<sup>④</sup>，构建社会工作的疗法和模式，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理论创新途径。以此来解释命运、禅定、诗词、正念、持定、内圣等传统在现代社会工作中的运用。另一方面，实践的创新则强调社会工作者转变服务的态度、视角、方式以及意识，在本土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体验、意会、顿悟、涵泳、体察、熏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方法的适用性，并探索出基于中国政治脉络的社会工作模式、制度以及政策体系等，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方法、技术、道路以及制度自信。

#### （四）契合：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自洽

首先，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中西对话。巴赫金明确提出，“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sup>⑤</sup>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就是对社会工作中国化和中国命题简明扼要的解释，重点在于确立“他者”与“自我”互为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强调站在“西方”之外审视“社会工作”，明确中西文化对话成为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这种中西对话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西体中用”，即以文化和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概念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文化和具体实际而加以改造成为新的社会工作理论；二是“中体西用”，即以中国已有理论和概念作为基础，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加以论证和补充而形成新的社会工作理论；三是“视域融合”，即融合社会工作的共同特征与逻辑而提出一种社会工作理论。三种不同方式各适用于不同的实践领域以及不同的问题，但总体看来“中体西用”和“视域融合”是较为可行的方法和策略。

① 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② 奂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以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③ 何雪松：《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社会建设》2014年第2期。

④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4—255页。

⑤ 巴赫金：《答〈新世纪〉编辑部问》，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0页。



其次，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古今对话。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无论走得有多远，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既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等本土化发展的经验，更要善于运用从老子、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延续而下的经典渊源；既要充分吸收当代国外最新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和学术前沿，也要从西方古老哲学中吸取经验；要深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挖掘丰富的学术宝藏。正所谓“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尤其要对国学典籍中的《尚书》《礼记》《周易》《论语》《孟子》《荀子》《黄帝内经》《孙子兵法》《史记》等有所熟悉，既要同理心去解读文本，又要能跳出其思维定势而有所创新。另一方面要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社会工作学知识的理念、术语、模型、方法、脉络等熟练掌握，并以现代社会工作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

再次，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理实对话。在社会工作学科发展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分割运行一直是社会工作自身专业化发展的极大障碍。许多社会工作者在处理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专业层面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很难系统性地自觉运用任何一种理论，甚至带有某种“反理论”立场的倾向，而这种“反理论”的立场又使得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宝贵的专业价值更多地流于经验层面，从而最终造成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双重不利影响。<sup>①</sup>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创新与发展要坚持“顶天立地”的格局，既要有学术前沿意识和理论高度，又要有服务现实的勇气与实践的行动，打通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让理论观照实践，让实践回应理论。一方面，社会工作要坚持以思辨的方式发展自身的元理论，对社会工作中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环境的本质、身心关心、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以及价值论等进行理论建构；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要坚持发展“中层理论”与实践理论，并以干预研究、行动研究以及循证实践的方法去检验、验证与巩固这些理论，最终促进基于本土实践的社会工作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因此，“思想驱动”的理论社会工作研究与“循证驱动”的实证社会工作研究都是社会工作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差异仅是分工不同而已。<sup>②</sup>

最后，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学科对话。虽然名义上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一门“学”的高度，实际上仍然是作为一个专业来建设的。相比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还只是在一个初级阶段，既没有很丰富的学科积累，也没有本土的理论建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积极从跨学科、跨专业和跨领域的对话中获得理论素材和思维启发。具体来说，除了像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一直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借鉴理论素材以外，中国社会工作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与整合。比如通过与文学进行学科对话，积极探索社会工作的阅读疗法、诗词疗法和写作疗法；与艺术学进行学科对话，积极探索社会工作的艺术疗法、音乐疗法以及戏剧疗法等；与数字技术进行学科对话，积极探索社会工作的网络疗法、影视疗法以及影像发声疗法等；与体育休闲学进行学科对话，积极探索社会工作的舞动疗法、桌游疗法、运动辅助疗法等；与生态学进行学科对话，积极探索社会工作的园艺疗法、动物陪伴疗法与旅游疗法等；与哲学进行学科对话，积极探索社会工作的意义疗法、尊严疗法以及日记疗法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科对话，积极探索社会工作的正念疗法等。

任何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找“学术生存空间”和“学术自主地位”，也希望结合“在地智慧”探索出适合自身的“本土特色”，最终成为一种“‘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学术”（柯林伍德语）。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正是这样一种不断追求自身独立与发展的过程，不仅需要一位又一位、一代又一代社会工作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不懈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对这个过程保持一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包容并蓄”“行胜于言”的尊重与理解，为着行动者的努力而尊重每一位前行者的付出与探讨。通过不断的探讨与碰撞，真正实现社会工作不同理念与理论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责任编辑：何 频）

① 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② 姜永志、阿拉坦巴根：《心理学的理论觉醒与理论自觉——拷问心理学理论研究》，《理论月刊》2012年第6期。